



·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 西北大学中文系 主编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代文学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51

唐代文学研究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西北大学中文系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3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8.125 字数204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7—5633—0945—4 / I · 031

定价: 4.50元

《唐代文学研究》编委会

主 编 傅璇琮

副主编 梁超然 阎 琦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运熙 王启兴 江 淳

朱金城 陈伯海 李云逸

张明非 罗宗强 郁贤皓

党玉敏 梁超然 阎 琦

傅璇琮 董乃斌

编者题记

●傅璇琮

《唐代文学研究》第一辑于1988年秋出版，接着于是年9月在太原召开了“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四届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上，不少学者对学会的两个刊物，即《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及《唐代文学研究》（包括其前身《唐代文学论丛》），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对此后的工作提出若干改进的意见。经过学会理事会的讨论和同意，这两个刊物的编辑部虽仍分别设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和西北大学中文系唐代文学研究室，但编委会的组成则作了较大的调整。调整后的两个刊物的编委会，是以中青年学者为主的，这正反映了我们现在唐代文学研究的实际。我们的不少中青年研究工作者，在老一辈专家的指导和熏陶下，得到长足进步，已经成为我们整个工作中的骨干。刊物的编委会，理应反映这一客观实际。我们希望，并且也相信，新的编委会必将联系各方面的研究者共同努力，把刊物办成真正能体现我国唐代文学研究水平的、具有收藏价值的学术文献。

中青年学者近些年来已成为我们唐代文学研究界的主干，这一情况在本辑的篇目中也可看出。这一辑共收论文18篇，绝大部分是中青年学者所作。人们不难看到这些论文所显示的工力，而且还可以感觉到论文作者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我们有理由对唐代文学研究的前景表示乐观，那种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已经陷入僵局、面临危机的说法，至少在唐代文学研究这个领域内，是不符

实际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已经尽善尽美，没有一点问题了。正好相反，不少学者是清醒地意识到，唐代文学研究要继续前进，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其中之一，是我们的研究结构还不尽合理，这种不尽合理的状况在本辑篇目中也同样可以看到。

读者不难看出，这一辑绝大部分是资料、考据之作，只有少数几篇属于理论探讨。在一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到底应着重于理论研究还是资料考证，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就唐代文学研究来说，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两者并重，不可偏废，而且这些年来，我们在理论和资料上，确实也都是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的。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并没有发生两者彼此妨碍的情况，在研究者中，也不存在偏重于理论探讨或偏重于资料考证的彼此相轻的现象。相反的，我们倒可以举出好些个理论和资料互相促进，不同研究趋向的学者互相尊重并结成深切友谊的动人的例子。在学科发展中，本来就有资料 and 理论两个侧面，它们有时得到平衡的发展，有时可能其中之一发展较为突出，依靠研究者的努力，这种不平衡的状况终究是会得到调整的。理论和资料，本不会彼此抑制，而只会互相促进。近十年来众多作家作品的考证和唐人诗文集的整理，不是使得我们的理论研究安置在更加信实的材料基础上了吗？而不少学者关于文学思想史和作家研究在理论上的突破，不也是使资料的辑集和甄别更有计划地向广度和深度开掘吗？不过，从这些年来的实际情况看，资料考据的论著在数量方面确实是较多了一些，我们的研究者似乎以较多的力量投入这方面的工作，因此从总体上说，研究结构有所倾斜。这种后果在短期内还不大容易感觉到，稍长时期来看，就有可能因减弱理论探讨而使我们的唐代文学研究缺乏应有的深度。当然，我们所要求的理论文章，是从实际出发，是从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对文学

现象所作的概括，而不是脱离实际的空论。对于近些年来跨度很大而内容空泛，动辄数万言而实则一无警策的长文，人们确是有所反感的。我们希望宁可题目小一些，讲得实际一些，从一个具体论题的探索能引起人们对较广泛的文学现象的思考。

资料考证的著述虽说比较多，也较有成绩，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我们感到考证的题目小了一些，也零碎了一些。我们的研究者似乎习惯了对一些具体作家作品中的问题进行专题考索，还不大习惯于对一个时期、一种文学现象作综合的研究，即既有材料的排比整理，也有相应的必要的归纳和概括。这是要花费相当时间的。无论是搞资料，或者是搞理论，真正要能有所成就，就非要有积累不可。没有积累，资料考证或理论阐发，都不过是象雨点落在河面上泛起的小水泡。在这里我们想起了左思《咏史》的两句诗：“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希望我们的研究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排除世俗的各种干扰，以我们坚韧的努力，为祖国的整个文化事业奉献我们的精品。

最后还要提及的是：一、本刊从第二辑起改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在学术著作出版十分困难，而学术刊物的出版则困难更多，其中主要原因是出版学术刊物更赔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计经济亏损，毅然承担本刊的出版，而且还能作出一年大体出版两辑的安排，我们在表示感谢的同时，也坚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学术界的这种支持，必将为历史证明是有远见卓识的。我们唐代文学界愿意与他们作进一步的合作。二、本辑的审阅和加工，西北大学唐代文学研究室的同志们作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阎琦、李云逸等同志。他们除了阅稿外，还需与作者、出版社，以及远在南宁的梁超然同志和在北京的我书信联系，这得花去他们不少的时间，影响他们自己的教学和研究。超然同志也在本辑的编辑出版上花费不少精力。我们几个人，超然同志、阎琦同志与我，是合作得很好的。我们日常都忙于本职工作，差不

多都是用业余时间来编这个刊物的。限于条件，工作中一定会有不少缺点，希望作者和读者批评指正。我们愿意为研究者的成果得以刊布而略尽微力。

1989年8月初稿

1990年2月改定

目 录

编者题记	傅璇琮 (1)
王绩与魏晋风度	贾晋华 (1)
盛唐诗歌的美学风貌	王启兴 乔典运 (8)
略说韩愈的散文美学观	高海夫 (20)
论唐代无新乐府运动	周 明 (35)
唐代题画诗的美学意义	陈华昌 (41)
王绩三仕三隐补辨	张大新 张百昂 (59)
卢照邻生平行迹再考	任国绪 (70)
骆宾王系年考	王增斌 (79)
李华生平考略	谢 力 (105)
李嘉祐诗疑年	储仲君 (134)
汪伦小考	李子龙 (171)
皎然生卒年考	张靖龙 (177)
“弟走从军阿姨死”新解	葛崇烈 (183)
张祜系年考	尹占华 (186)
中唐诗人事迹小考	陶 敏 (206)
“芳林十哲”考	周勋初 (213)
李商隐无题诗、寄托诗考辨举隅	周建国 (225)
晚唐若干诗人生平事迹及其作品考辨	吴在庆 (238)

王绩与魏晋风度

●贾晋华

王绩是隋唐之际一位复杂而奇特的诗人。他一生三仕三隐，显示了社会事功与个体人格之间的深刻矛盾，这一矛盾最后解决于模仿魏晋风度、实现个人价值。而他的诗歌创作，正是这一矛盾结果的产物。

王绩出身于“地实儒素，人多高烈”的世家，其兄王通又自命为“当世孔子”。但他却从小博览百家，受到儒、道、阴阳等诸家影响，自称“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望气登重阁，占星上小楼”（《晚年叙志示翟处士正师》）。吕才也说“他“阴阳历数之术，无不洞晓”（《王无功文集序》）。同时，他又天性嗜酒，简傲不羁，“纵恣散诞，不闲拜揖”（《答处士冯子华书》）， “受性潦倒，不经世务。……加性又嗜酒，形骸所资”（《答程道士书》）。这种独特的思想修养和才性精神，使得王绩一开始就倾心于阮籍、嵇康、刘伶、陶潜等所代表的魏晋风度与名士风流。他在《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诗中说：“忆我少年时，携手游东渠。梅李夹两岸，花枝何扶疏。……尝爱陶渊明，酌醴焚枯鱼。尝学公孙弘，策杖牧群猪。”吕才《序》记其年轻时情况云：“性简傲，饮酒至数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刘伶，与闭户轰饮。’……高情胜气，独步当时。”

王绩一生经历了由治而乱，又由乱而治的历史风云变幻。他年轻时，正当隋炀帝大业初，政治上尚呈现一片“艳艳风光，欣欣怀抱”（《三月三日赋》）的升平气象。王绩此时也颇有“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晚年叙志》）的积极用世思想。但当他顺利步入仕途，任秘书正字的清职未久，却自请外任，而任六合丞未几，又因纵酒而“屡被勘劾”，托疾去官，轻舟夜遁。关于这第一次辞官的原因，王绩自说是不乐出仕，自移其行（《无心子》）；吕才说是“端簪理笏，非其所好”，“笃于酒德，颇妨职务”；现代有的研究者则认为是王绩觉察到隋政将乱，预作逃避。王说与其年轻时志向及其后再次出仕之实际情况不合，恐非真意。后说则缺乏确切的凭证。故我们倾向于吕说，认为王绩此次辞官，是其简傲不羁个性与官场礼法冲突的结果。王绩有《解六合丞还》诗云：“彭泽有田惟种黍，步兵从官岂论钱。但使百年相续醉，何辞夜夜瓮间眠。”说明了他正是以阮籍、陶潜的自由精神为榜样的。

王绩此次辞官后，并非真正归隐，而主要是漫游南北。其后，在隋末大乱、群雄逐鹿的数年中，王绩雄心复起，自谓“风云私所爱，屠博暗为俦。解纷曾霸越，释难颇存周”（《晚年叙志》）。所谓解纷释难，语焉不详，很可能指依附窦建德时的作为，因窦的失败而隐晦不扬。吕才《序》所记王绩此段经历，亦颇含混矫饰。由于王绩托身非所，失去了与李唐统治者风云际会、建功立业的良机。他在《建德破后入长安咏秋蓬示辛学士》诗中说：“遇坎聊知止，逢风或未归。孤根何处断？轻叶强能飞。”《薛记室收过庄见寻》亦云：“尔为培风鸟，我为涸辙鱼。”正表现了彷徨失所的心情。因此，虽然他在窦建德败后未久，即应征出仕唐朝，待诏门下多年，却始终未有机会升迁。至贞观初，其兄王凝得罪了朝中权贵，王绩失去了在唐王朝实现政治抱负的最后希望，不得不再次拂衣归田。关于王绩的第二次退

隐，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对唐王朝无好感，有的则认为 是 官 场 黑 暗。但实际上王绩对于唐初百废俱兴、君臣相得的清明政治是十分好感的，《答冯子华处士书》说：“乱极至治，王途渐亨。天灾不行，年谷丰熟。贤人充其朝，农夫满于野。……公卿勤勤，有志礼乐。元首明哲，股肱惟良，何庆如之也。”他的退隐，主要是自知与李唐统治者有失之交臂，难于自致高位，建功立业：

“吾自揆审矣，必不能自致合辅，恭宣大道。”（《答程道士书》）“起家以禄仕，历数职而进一阶，才高位下，免责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于是退归，以酒德游于乡里。”（《自撰墓志文》）隋末乱世出了许多英雄，其中有不少是与王绩一样的文词之士，如秦王府十八学士、王绩的好友薛收，就是十八学士之一。心性极高的王绩既失此良机，又不甘“才高位下”地循资而升，于是他为自己设计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以酒德游于乡里。”

这条道路与魏晋风度相通。“酒德”正是魏晋名士风流的特征之一。魏晋时期，儒学衰落，玄学兴起。玄学重精神才性，从而唤起了人的觉醒，个性得到尊重，人的价值得到提高。阮籍、嵇康进一步提出“任自然而越名教”的观念，高标人格精神、自我意识，否定传统观念与礼俗，蔑视外在的功业、名位、节操。竹林七贤背礼败俗，放浪形骸，却以其人格、精神、才情、风度受到当代及后世的尊敬和顶礼，获得至高的声誉。这就为其后的文士指出了一条实现个人价值的新道路。王绩正是希望通过这一条道路，以高超的人格精神弥补社会事功的失败，失之东隅，收之西榆：“归来南亩上，更望北溪头。古岸多盘石，春泉足细流。东隅诚已谢，西景惧难收。无谓退耕近，伏念已经秋。”

（《晚年叙志》）因此，他在生活中处处以竹林名士为榜样：“阮籍随性，刘伶保真”（《祭杜康新庙文》）；“阮籍生年懒，嵇康意气疏”（《田家》）；“坐棠思邵伯，看柳忆嵇康”

（《春日还庄》）；“散腰追阮籍，招手唤刘伶”（《春园酒后》）；“旦逐刘伶去，宵随毕卓眠”（《戏题卜铺壁》）。竹林名士“非汤武而薄周孔”、“任自然而越名教”，他也糠粃礼义，非议周孔：“虽周孔制述，未尝复窥”（《答程道士书》）；“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赠程处士》）；“先生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也”（《五斗先生传》）；“而同方者，不过一二人，时相往来，并弃礼数”（《答程道士书》）；“乡族庆吊、闺门婚冠，寂然不预者已五六岁矣”（《答处士冯子华书》）。竹林名士好老庄，他也好老庄：“昔岁寻周孔，今春访老庄”（《赠薛学士方士》）；“床头素书三帙，《老》、《庄》、《易》而已”（《答处士冯子华书》）；“君又……注《老子》，并别成一家”（吕《序》）。竹林名士喜服食神仙，他也喜服食神仙：“且复归去来，刀圭养衰疾”（《采药》）；“酒中添药气，琴里作松声。石炉煎玉髓，土釜出金精。水碧连年服，云丹计日成”（《山中独望》）。竹林名士纵酒放浪，他也纵酒放浪：“晚年醉饮无节，……或乘牛驾驴，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动经数日”（吕《序》）；“在生知几日，无状逐空名。不如多酿酒，时向竹林倾”（《独酌》）。竹林名士箕踞散发，他也箕踞散发：“人或问之，箕踞不对”（《自作墓志文》）；“箕踞散发，玄谈虚论”（《答程道士书》）；“箕踞散发，同群鸟兽”（《答处士冯子华书》）。阮籍说：“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咏怀》）王绩则“常耕东皋，号东皋子。”（《自作墓志文》）刘伶撰《酒德颂》，王绩则撰《醉乡记》、《五斗先生传》、《酒经》、《酒谱》、《祭杜康新庙文》。阮籍以步兵厨营人善酿，求为步兵校尉，王绩则在第三次出仕时以太乐府史焦革善酿酒，苦求为太乐丞。——由此可知王绩第三次出仕诚如吕才《序》所说“以家贫赴选”，纯为筹措三径之资，并无用世之念，所以一出来就扮演了阮籍的放任角色，

并很快又以焦革夫妻去世、无人送佳酿为名，辞官归隐。实际上王绩在第二次退隐时，就已经定了长往之策。

除了竹林名士外，王绩奉为楷模的还有一位魏晋名士——陶潜。陶潜是魏晋风度的另一类型代表，他躬耕田园、诗酒自娱的生活道路正好适合王绩的情况。所以王绩在生活中也极力扮演陶潜的隐士兼酒徒兼诗人的角色：“陶生云：‘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跣脚东窗下，有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嗟乎，适意为乐，雅会吾意”（《答处士冯子华书》）；“解组陶元亮”（《山中独坐自赠》）；“草生元亮径”（《田家》）；“山酒漉陶巾”（《尝春酒》）；“陶潜醉日多”（《醉后口号》）。此外，陶潜的朴素自然的田园诗、隐居诗、饮酒诗也为王绩提供了最好的模式。王绩是北人，其先祖于西晋末年曾避乱南迁，但至宋、齐易代之际又北归；他年轻时的作品曾获得薛道衡的赏识（吕《序》），并与其子薛收结为密友。但他同时也与其他隋代诗人一样，受到南朝诗风的一定影响。他的集子中现存的几首早期作品，即体现了南北诗风的共同影响，如《被举应征别乡中故人》写得谨严，《裴仆射宅咏妓》写得靡丽。唐初以宫廷创作为中心的诗坛上，流行的正是融合南北的典丽谨严的诗风。但这种诗风并不适合隐士生活，只有陶潜的诗歌才是唯一的恰当模式。于是王绩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位仿陶者。他的诗歌极力模仿陶潜的朴素、自然、随意的风格，有时达到惟妙惟肖的地步。如《田家》三首：“阮籍生年懒，嵇康意气疏。相逢一饱醉，独坐数行书。小池聊养鹤，闲田且牧猪。草生元亮径，花暗子云居。倚杖看妇织，登垅课儿锄。回头寻仙事，并是一空虚。”“家住箕山下，门枕颍川滨。不知今有汉，唯言昔避秦。琴伴前庭月，酒劝后园春。自得中林士，何忝上皇人。”“平生唯酒乐，作性不能无。朝朝访乡里，夜夜遣人酤。家贫留客久，不暇道精细。抽帘持益炬，拔簣更燃炉。

恒闻饮不足，何见有残壶。”

明黄汝亨《东皋子集序》云：“东皋子放逸物表，游息道内，师老庄，友刘阮。其酒德诗妙，魏晋以来，罕有俦匹。行藏生死之际，澹远真素，绝类陶征君。”敏锐地看到了阮籍、陶潜等所代表的魏晋风度在王绩身上的复活。但是，仅看到王绩对魏晋名士角色的模仿还不够，还应看到他对这一角色的改造和创新。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达到陶潜的“澹远真素”。由于所处的社会时代有了很大不同，王绩的自然放旷和魏晋名士也有了重要的区别。阮籍等竹林名士生活于黑暗血腥的魏晋易代之际，他们以自然对抗名教，实际上是以理想对抗现实，表面上旷达放纵，洒脱风流，骨子里却异常痛苦悲愤，或悲观颓废。陶潜的自然旷达，主要是返朴归真，退出当时黑暗混浊的官场，抛弃世俗的功名利禄，从田园生活中找到人生归宿和心灵安慰，保持大朴无亏的自然天性。王绩是在唐初“逮承云雷后，欣逢天地初”（《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的清明时代定下退隐长策的，这个时代给他的印象是美好的，他曾一再在诗文中加以赞赏。因此，他的自然放旷较少对抗现实的悲剧因素，较多追求个性自由、实现个人价值的积极因素。他缺乏阮籍的深刻、陶潜的真淳，却有着一一种阮、陶所缺乏的乐观明朗。唐陆淳《删东皋子后序》云：“有陶公之去职，言不怨时；有阮氏之放情，行不忤物。”明高出《东皋子集叙》云：“与晋人之厌弃礼法、疾世若仇者不同。”王绩与魏晋名士对于时世态度的不同，正是时世本身使然。他在诗文中反复强调的是适意遂性：“足下欲使吾适人之适，而吾欲自适其适”（《答程道士书》）；“适意为乐，雅合吾意。……烟霞山水，性之所适，琴歌酒赋，不绝于时”（《答处士冯子华书》）；“幽人养性灵，长啸坐山肩”（《山园》）；“与制于物，宁在于己。……阮籍随性，刘伶保真”（《祭杜康新庙文》）。所谓“自适其适”，就是放任自己的自由天性，不受任何羁束，

追求个人价值，实现人格独立。他的诗歌虽然极力模仿陶、阮（仿阮主要体现在《古意》六首），但他的诗歌观念实际上与陶、阮大不相同。对于陶、阮来说，诗歌主要是抒写情性的工具；对于王绩来说，诗歌却是塑造自我形象、获取当代及后世声名的工具。

当然，王绩也并未彻底忘怀社会事功，他的内心深处，偶尔也闪现过失败的悲哀、孤独的忧愁：“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自作墓志文》）“饮时含救药，醉罢不能愁”、“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题酒店楼壁》）。他的退隐和扮演魏晋名士角色，毕竟是不得已的下策。他所生活的时代，毕竟是一个风云激荡、龙虎腾跃的英雄时代。这时时代适合于建功立业、出将入相，不适合于超然物外，高标人格。所以在那个时代里，王绩一直是孤独的、默默无闻的，除了好友吕才外，几乎没有人注意他和他的诗歌。一直到近一个世纪后的盛唐时代，国家承平日久，需要隐士逸民来点缀升平，终南捷径大开，加上佛道二教盛行，以及伴随着中外文化交流而来的思想解放，从而使得魏晋风度以新的精神和活力复兴，王绩的生活道路、人格精神和诗歌风格这才获得了普遍的反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绩是盛唐精神和盛唐诗风的一个孤独的先行者。

注：

本篇所述王绩生平及作品系年，参考韩理洲《王绩生平求是》、《文史》18辑；《王绩诗文系年考》，《山西大学学报》，1983年2期；及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一王绩条。

盛唐诗歌的美学风貌※

●王启兴 乔典运

盛唐诗歌空前繁荣，“动容皆是舞，出语总成诗”，诗歌创作风靡朝野，在日常生活中也成为极普遍的事情，独孤及言及当时文坛时的一段有趣的记载最能说明问题：“于时天下无兵，百二十余载，缙绅之徒，用文章为耕耘，登高不能赋者，童子大笑。”（《唐故朝议大夫高平郡别驾权公神道碑铭》）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侧面都被他们的心灵诗意化，成了他们述志抒情的对象，因而即使在最习见的、平常的事物中，也能发现丰富多彩的美；从作家群体上看，也是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青楼歌妓、引车卖浆者流，无所不有，诗歌创作也成了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永恒的母题，还是瞬间的心绪；无论绵长的期待，还是片刻的喜悦；也无论是他人的境遇衷肠，还是自我的爱憎得失，他们都通过诗作加以歌吟。他们认真地总结和吸取了六朝至初唐成功的艺术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自觉或半自觉地将它放置在盛唐文化的灿烂金辉下曝光，给它易装，给它着色，给它灌注一种风骨俊爽的时代气息。在这色彩斑斓的万花筒中，盛唐诗歌呈现出一种文质相兼，绚丽多姿的创作走向，同时也向我们展

※ 原文题为《盛唐文化与盛唐诗歌》，此处发表的是其中一节，题目是编者另加的。

示了各种时代感极强的美学风貌。

真率自然的精神美 盛唐是一个天真烂漫的时代，天真得近乎幼稚，烂漫得有些任性，无拘无束，洒脱自然。这样的精神状态，实是历尽事故，饱经风霜之后的中、晚唐时代所不能望其项背的。盛唐诗歌是盛唐人灵魂的大展示，是他们生命本体内活的情感的自然释放。你看，“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张说《蜀道后期》）“积雪与天迥，屯军连塞愁。谁知此行迈，不为觅封侯！”（高适《送兵到蓟北》）这“异客”之思，这游子之意，这征人之情，全都以不可遏止的方式从诗人胸腔中奔腾而出，在这汹涌澎湃的诗的海洋中跃动着一股热烈而真率的情绪之流。它发自肺腑，毫不矫揉造作，它不是诗人的意识或潜意识受到压抑后的变形的发泄，而是人的潜能的正常输出，诗人们从“真”中传播着美，读者也从“真”中感受着美。《庄子·渔父》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在真率而自然的艺术世界中，美是无所不在的。基于对人本身潜能的豪爽自信，盛唐诗人从不掩饰，也不愿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他们的喜怒哀乐，好恶臧否，都以极自然的方式道出，或激越，或舒缓，但都具有一种纯情的力量。当然，最富于代表性的莫过于李白的诗篇。他“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喜则“千金骏马换小妾，醉坐雕鞍歌《落梅》”（《襄阳歌》），怒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哀则“正当今夕断肠处，骊歌愁绝不忍听”（《灞陵行送别》），乐则“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对自己